

中国当代文化现象

ZHONGGUO DANGDAI WENHUA XIANXiang

观察丁玲

陈漱渝 主编

杨桂欣 编

中



G U A N C H A O D I N G L I N G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中国当代文化现象
主编 陈漱渝

观察丁玲

杨桂欣 编

中

大众文艺出版社

风雪人间（节选）

初到密山

6月末的一天，凌晨四点钟，我到了密山。这是黑龙江省东南角上的一个小县城，离兴凯湖不远，在未开发前，可能是只有十七八户人家和两三个留人小店的一个边境小屯。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为着军事上的需要，也为着经济侵略的需要，在这里修建了大营房，组织开拓团，开发这一片不毛之地。但是遇到了当地人民的反对和抵制，他们没有搞好久。东北解放初期，人民解放军在北大营旧址创办了第一所航空学院。我的儿子蒋祖林在1947年冬天，就穿着从河北建屏领到的一套薄棉衣，和几个同学，千里跋涉，来到这个学校学了几个月。这个地方真正兴旺热闹起来却是近几年的事。建国以后，王震同志出任中央农垦部长，大批铁道兵部队的官兵，每年绵

绵不断地涌入完达山脉，虎、饶地区，乌苏里江沿岸及兴凯湖畔，安营扎寨，屯垦戍边。大批长期鏖战在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和鸭绿江边、大同江畔的英雄健儿们，放下枪支，拿起锄头，使这千里莽林荒原，迸发出青春的火光。在边境线上，几十个军垦农场兴建起来了。密山，便成了这些农场的指挥枢纽和后勤基地。城镇虽小，却充满了新生的气象。

东方升上来的太阳，照着我的身影。在密山，一个熟人也没有，我还只是孤身只影。车站很小，同所有的小车站也不一样，上下旅客不拥挤，也不会有来迎接我的人。但我看见这里人同人都是笑容满面，都是高兴地走过来互相说几句话，好像是老友重逢。开始，我不免有点担心：“该不会有人认出我来吧？”但他们彼此之间也都是这样，看来，谁都不认识我。

怎么？是不是我脸上的“金印”淡下去了？是不是我的高帽子矮了？好像没有人想追究我是谁，只要是到这里来的，就都是农垦战士，各个农场都正需要大批的人手哩。他们一视同仁，把我当成他们中间的一个。

我因为到得太早，密山农垦局的大门还关着，我便和我那位同行者一道去逛大街。大街上店铺也没开门，路上只有很少几个行人。一间卖豆腐脑的小店门口挤了不少刚下火车的人。我们去买了两碗，坐在道旁一棵柳树下吃了起来，几只早起的母鸡在我身边啄食。我们又走向山坡，

望见四面八方都是新修的公路，都是通往各个农场的路。我想，我将走向哪里？看来，这里就是我今后安身立命之所，就是我“重新做人”的起点了。幸好，我可以放心，这里的人还是很和气的。但是，一旦他们知道了我带来的那份不光荣的介绍信，他们读过报（怎能不读报呢？），开过会（怎么能不开反右的会呢？），那他们将如何看待我呢？离京前，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劝我下来改一个名字，想来是有道理的。只是我知道老是骗着人，骗取人家对我的信任、对我的好感，我心里可能会更加不安。两相比较，我想还是应该老实地对待群众，老实地对待自己，即使十分难堪，也属“罪”有应得，也是只有咽下去的。我反复想来想去，这又有什么了不起呢！

八点钟时，我再去农垦局，王震同志还没来，我们被安排住在招待所。招待所住的都是来往的干部，这里的空气似乎比外边世界严酷多了。我总是一个人独自坐在我的小房里看书，为了躲避人们审查似的问话或眼光，我又总是到外边散步，像幽灵似的在这个小镇上、在镇子的周围徘徊着。

密山，我是喜欢你的。你容纳了那么多豪情满怀的垦荒者，他们把这块小地方看成是新的生命之火的发源地，是向地球开战的前沿司令部。当年威震湘鄂，后来又扬名南泥湾的矿工出身的王震将军，就常驻节在这里，指挥千军万马，向大自然挑战，勒令土地献米纳粮，把有名的北

大荒变成富饶的北大仓。这样一场与大自然斗争、与人们的好逸恶劳思想斗争的运动，怎能不激发我的战斗热情，坚决勇敢地投入伟大的建设者的行列中去呢？可是，我又感到我成了一棵严寒中的小草，随时都可能被一阵风雪淹没。我恼恨自己的脆弱；可是，再坚强，我也不能冲破阻拦我与世隔绝的那堵高墙，我被划为革命的罪人，我成了革命的敌人。我过去曾深深憎恶那些敌对阶级的犯罪分子，现在，怎能设想别人不憎恶我呢？我曾以为只要我离开了北京多福巷，只要我生活在新的人群里边，我的处境就可以一天天变得好起来。现在，我到了密山，密山的人们对我不坏，我对密山的印象也很好。只是，那是因为人们还不知道我是谁，我在装成一个好人，一个心里无事的普通人的样子，才能得到这份平等对待。假如我露出了插在我头上的标签，我还能这样安静无事吗？我就像发寒热病似的在不安中度日如年地过了一天，两天……

见 司 令 员

我在极度不安中用所有的精力准备着与王震同志的会面。记得远在1936年12月初，我随红军前方总政治部杨尚昆同志从保安到了定边的绍沟沿，前方的指挥员都集中到这里，研究怎样同胡宗南打最后的一仗。我在这里见到肖克，见到陈赓，后来又有一个穿狐皮领子大衣的军人走

进窑洞，用湖南腔大声嚷道：“啊！听说来了一个女作家，在哪里呀？”当时，我很惭愧，没有说话。他似乎是在对我说：“欢迎！欢迎！我们这里都是武将，没有文人。我们非常需要作家，是吗？”他又转向别的同志，然后高声笑着，走出去了。别人告诉我，他就是王震。以后大约我们还见过面，点过头。1943年，中央党校秧歌队去南泥湾慰问三五九旅，我跟着去了，但是没见到旅长王震同志。全国解放后，他去了新疆。1954年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散会时，我挤在人群中，他忽然喊我，笑着说道：“你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我读过了，写得很好。”我惊诧了，而且脸红了。我没有想到像他那样的武将，政务繁忙，会有时间读我的小说？而且还那末直率了当来了一个评价。我仓促间不知该怎么回答他，只是感激地对他笑了一笑。这以后我们没见面了。自然，像他这样的红军将领，我很早就听到过许多对于他的赞扬，我自己也是容易崇拜革命家的，王震这个人在我的心目中一向就是有地位有分量的。但现在，我要到他的治下来接受劳动改造，现在要去见他，我将以什么态度，用什么心情，来向我向来崇敬的人谈话呢？自然，我现在不是一个受欢迎的作家了，也不是曾得过他赞许的同志了，现在我成了革命的敌人，我是阶下囚，我将怎样开始我们的谈话呢？我能否继续把他当作一个最能使我敞开胸怀，掏出一颗受折磨的、虔诚的、破碎的心的同志呢？我能在他的面前为自己申辩哪怕只是

短短的几句话几个字吗？难道我只能把他也看成是一个神圣的法官，将要在他面前一次又一次地认罪吗？……我在农垦局的会客室里等了一会儿，后来被领到楼上局长的办公室。局长还没来，有两个像是秘书的人陪我坐着，彼此都不说话，我等着那最紧张、最重要的一刻。

我听到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夹杂着高声的朗笑，我自然地站了起来，没有低头，望着前方，一群人走进了屋。我张眼望去，王震同志正站在我对面，他落了座，也招呼我坐，我就坐下来了。我不知该说什么，也不知该作什么，默默地把眼睛望到远处，是一副漠然的样子。他刚刚在门外还笑来着，现在，他不笑了，静静地，可能是正看着我吧。他用一种什么心情、什么眼色看我呢？我感到他可能用一个负责人的态度在对待我，他这时不会对我个人表示什么感情。我想，他过去并不很了解我，但是一定会听到过许多对于我的这样那样的诽谤，尽管他读过我的一篇小说。在漫长的经历中，他看见过的人，伟大的、渺小的、有功的、有罪的、无功无罪的都太多了。他经历过无数次的战斗，在战场上同敌人肉搏，他爱同志，他对人民对战士都非常热情，但他也处治过人，他是革命将军。我也不是毫无阅历的，也算是会观察人的，不是一点不懂在什么时候最好怎么说、怎么作。可惜我就是不愿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一个人起码不能违背自己的良心。我便不声不响，什么也不说，等着他发话。

屋子里静极了，这时，没有旁人说话的地步，大家都看着部长，等他说话。

王震同志自然没有过去那样对我的笑容了，但也不过分严肃。他只说：“思想问题嘛！我以为你下来几年，埋头工作，默默无闻，对你是有好处的。”这几句话我永远记得，而且的确对我很有好处。但这时，我只想：这些话也对，但并没有说到要害，很难怪他呵！王震同志接着说：“我已经叫他们打电话给八五三农场，调陈明来，同你一道去汤原农场。那里在铁道线上，交通方便些，离佳木斯近，住处条件较好些，让他们给你们一栋宿舍。”

我仍然没有说话，他便又说下去了：“你这个人我看还是很开朗，很不在乎的，过两年摘了帽子，给你条件，你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你愿意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这里的天下很大，我们在这里搞共产主义啊！”

他不再说了，可能是在等我。我踌躇了一下，不知道该怎么说，想什么都不说，可是我突然说了：“契诃夫只活得四十年，他还当医生，身体也不好，看来他写作的时间是有限的，最多是二十年。我今年五十四岁，再活二十年大约是可以的，现在我就把自己看成是三十岁，以前什么都不算……”说着说着，我发现自己在这时还说这些大话的可笑，便停住了。我看出，大约不知道我为什么突然扯起契诃夫，他的表情平常、漠然。是的，我们之间还是隔有一座高山，这一点也不怪他。他是个好同志，在这种

时候，对我们这种人，肯伸出手来，即使是共产党员也是很少的，是极难得的。他真是一个有魄力、有勇气的同志，我感谢他，将永远感谢他。可是，真正的了解，则谈何容易啊！后来，他每年到垦区视察工作，还对我讲过许多话，给过我许多帮助，这都将在以后再说。

他给了我一封写给佳木斯合江农垦局局长张林池同志的信，最后说了一句：“安心等陈明，他一两天就要到了”。我告辞走了出来，孤单单的独自一人站在街头，无处可走。我慢慢走到山坡上，望着伸向远方的公路。陈明！陈明啊！你将从哪条路走来咧？

相 会

第三天，吃过中饭，我正躺在床上看书，门呀的一声开了，走进来一个人。我认识他，但又觉得不是他了。这是怎么的？我一下跳下床，陈明猛地扑过来，把我挡住了。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我们一时都说不出话来。我们分开才三个多月，他又黑、又瘦，显得老了，但很有精神。他深深地望住我，怜惜地说：“只要在一起，什么都好，是吗？”于是我们并排坐在床上，他向我讲他是何时得到通知的，他是怎么来的，他舍不得离开八五三农场，舍不得那一同挖井筑房、平地起家、共过艰苦的战友。我摸着他的手，又粗又硬，简直不像他的手，这是他吗？就

是他。还是几个月前我们分手时那样的知心，那样的体贴，我只能从他旧有的轮廓来印证他外形的变化。陈明发现了我的诧异，深沉地说：“我现在是一个农工，一个农业工人，常在风里雨里，太阳晒，怎会没有变化呢？不过，我的心是不会变的。共产党员，能上能下，什么事不能干？在多福巷的时候，我们就说过，今后要努力改变自己的社会存在，改变自己和社会的联系，改变自己的成分。今天，我在招待所的登记簿上填写成分时，我写的是农工，我感到自豪。我现在拿我的双手为社会主义服务，还用我的双手照顾你，我只希望你快乐些。你应该快乐地活下去，而且写文章。我们不背包袱，白手起家，从零做起，从负数做起，我们要在这里共同走出一条路来。”

陈明和我总不是完全一样的，他有些想法比较简单，而且从好处想得多。他也曾痛苦过，我永远记得，他在被开除党籍那天流的眼泪，一个从来不流泪的人，忽然流泪了，而且，泪水是那样止不住地涌出来。我无法安慰他，只能陪着他哭，我懂得他，为他的那颗心而哭。但他以后再也不提这件事，好像他仍是一个党员那样坚强地生活。他总是用一些使人愉快的消息，一些好的想法，来安慰我，支持我，鼓励我。我有时会觉得他太简单了，他可能还不全懂得我；但他却又使我常常想到，他怎么会不懂得我？正因为他太懂得我，所以才这样的。他把一切忧愁都悄悄地放在他一个人身上，而把乐观却捧给我，让我能过

得稍微舒展些。我也的确因为他，因为他的支持，受他的影响显得更坚强些。假如他是一个多愁善感，或者消极悲观的人，那我的心境一定将是一潭死水，毫无生气，终会被痛苦埋葬。我怎能不体贴他，而也振奋起来呢？

今天是7月1日，招待所食堂的黑板上写着通知，党员同志都开会去了。我装着好像不知道这回事，陈明也不说话，我们表面上都很平静，可是我们不能安心躲在招待所的小房子里。我们凄然地走在大街上，在村边，在没有人的地方，默默行走。我想着过去，想到延安，那年在文协山头上开“七一”纪念会，李又然、吴伯萧，因申请入党未得批准，他们痛苦地离开大家，独自下山徘徊的情景。而现在我们却是被无辜地开除党籍，离开了母亲的怀抱，离开了战友、同志，无亲无故，两个人形影相对，在这不毛之地，沉吟徘徊。整个下午，我们在密山寻找可走的地方，我们去火车站，买了车票，我们是从这里来的，明天将从这里出发。

车站像一座农具仓库，路边排满了农业机械，许多人在这里观看、抚摸。我们又走上山坡，陈明指点我，哪些路通往哪个农场，他是从哪条路来的。我们走向附近的停车场，上百部十轮卡车停放在这里，是从各个农场来这里运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天黑了，我们不愿回招待所，便去小饭馆吃饭，在这里听到从农场来的人的谈话。这些谈话的内容，这些人物，都能引起我们对生活的向往

和热爱，可以排愁解忧。陈明很像一个农垦战士，人们都乐意问他点什么，他无所顾忌地讲故事给他们听，有时又加点幽默。人家欢喜同他接近，我自然而然地觉得轻松了许多。密山！我是喜欢你的，可是我们得离开你了，我们前面的路程可能是很好的吧！

7月2日，我们两个人便乘火车去佳木斯了。

远 方 来 信

喂完了最后一趟料，天色黑下来了。畜牧队打夜班的老王头正在各个鸡舍里巡视，看有没有没关好的窗户，有没有没关好的小门洞，看火墙的炉火烧得旺不旺。我走出屋子，踩着冻实了的鸡粪和嵌着白色羽毛的硬梆梆的沙土地走到院子外面的路上，路边都是积雪。漫天灰濛濛的一片，只有太阳刚下去的那方还显着一抹微微带紫或暗红的颜色；但这也不会长久，很快就要溶入那整个的灰濛濛里去的。我走在这里只是为着望望这灰色的寥廓的天，望望路边几株掉完了叶子的枯枝。路上没有人，即使在大白天，这里也是少人走的，这不是大路。一点风也没有，是不是随着天，随着地都冻住了呢？不，不可能的，风总是会移动的，天的那边还有人嘛！那边，那边不远不是有房子吗？那儿是农场场部，是我们农场办公的地方。而且，就在我住的院子后边，不是满满住得有一个院子的鸡吗？

那几个养鸡姑娘不就是搬到那个院子里住的吗？原来她们和我住一个院，就住在我间壁，每天晚上她们都到我屋子里来玩一阵，是一群天真朴实的姑娘。后来农场领导为了要孤立我，要她们与我划清界限，就命令她们搬走了。每天晚上就只我孤凄一人独自在这条路上徘徊。一个人也好，我就一个人占领这偌大的天地。我可以一个人在这里走来走去，没有人注意我，没有人窥视我，直说就是没有人监视我，我可以安静一会儿，让思想自由飞翔吧。在西北边，越过辽阔的耕地，越过一些小村屯，有一个热闹的小城，煤城。因为有煤就一年年兴旺起来，听说已经是一个有四十万人的城市了，这个城叫鹤岗。在鹤岗北边，临近黑龙江江边还有好些小城镇和许多农场。这样，鹤岗就显得更重要了。又逢大跃进的年代，从佳木斯到鹤岗的火车线路要建复线，在天寒地冻滴水成冰的时刻，抢农活冬闲季节正好赶修这条线路的土方工程。陈明就跟着他所在的生产二队去到那里。这样我们刚到北大荒两个多月就又分开了。他是9月下旬去的，现在又快两个月了。这两个月的日落黄昏，都是我一个人在这越来越冷的路边，踽踽独步，把思想，把思念，把依依难舍的恋情每天托付这灰暗的浮云寄了过去。他这会儿在做什么呢？他肩上压起的红肿块，消了吗？在窝棚里同同志们一块儿在烫脚吗？他会不会也走出窝棚看看天，望望从东南方向游来的黑色的云烟呢？不，云烟是走不到那里的，云烟都早已在半路消

失了。他会不会从飘去的微风中嗅到什么？感觉到什么？那里将含着薄薄的一缕馨香吧，一点点爱情的馨香吧。唉，太远了，什么都不能捎一点儿去。不，不要捎，不必捎，他已经带去了，带去了所有的温存，所有的知心。他就生活在这里边，他不会忘去的。而且一定会带回来的。到星期天、星期六的晚上他就会带回来的，把他的关心，把他息息相通的那些体贴就都带回来了。啊！星期六，实在令人想望的星期六呵！

星期六晚上，是修路工人回家来的时候。修路工人将满身带着雪花、冰屑和寒气走进屋子里来，不敲门就进来了。他会举起网兜，把铝饭盒拿出来，里面装着一些新鲜的菜肴，是从工地附近那热气蒸腾的小饭馆、小茅屋里买出来的；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没有病，没有伤，是神情爽利，是有力的眼睛和臂膀。他在修路时算是好劳力，有时还挑双筐和小伙子竞赛。有人说：“他是右派，好像不应该受表扬，不过我还是要表扬他。”于是屋子里亮堂堂的，热乎乎的，灯底下的语言是无所不包的，天下大事、工地趣事、好人好事、坏人坏事……但都会小心旧有的那些“伤口”，谁也不去碰它，让那些恶言恶语，那些丧心病狂像没有发生过一样。我们真的就是这样自足自乐。我像安徒生童话中的那个公主，蜕去了一身又污秽又耻辱的青蛙外皮，而露出本相，恢复了美丽的原形。我是一个天真无邪的人，是一个革命战士，是党的儿女，我享

受着纯洁的爱情，我简直不懂得忧愁。……星期六的晚上，是一个浪漫的梦，是一首美丽的诗，是一段百读不厌的文章。可是，今天是星期几呢？一天，两天，三天……还早得很呢。

西边，再西边，遥远的异国，我还有一对儿女咧。多可爱的儿女呀！他们都是在延安长大的。他们都有过父亲，可是我从来不忍心同他们谈到他们的父亲。让他们把党当成父亲好了。他们真的就是这样，都早早入了党，是正式党员。他们跟着党，过了多年的艰苦生活，在童年没有享受家庭的温暖，只有集体的欢欣；但他们有母亲，为了让他们健康成长，希望他们锻炼得坚强，母亲从没有对他们有一点娇生惯养。我的母亲曾怎样对待我的，现在我就怎样对待他们。我小时，从来没享受一点作为爱娇的闺女的幸福，没听到过一声心肝宝贝的亲昵的呼唤，我也拒绝了一个作为母亲的满饮母性的甜酒，但我欣赏我对自己母亲的了解。我们不是母女，而是朋友，是最贴心的朋友，是彼此生命的支柱。因此，我也希望我同我的儿女是朋友，是最知心的朋友。当他们很小，我怀抱着他们的时候，我就盼着他们长大。我感到有许多话要向他们说，满心希望他们成为妈妈的知己，是能同妈妈谈心，能无所不谈的，是最谈得来的。现在，风暴之后，能谈什么呢？能谈心里话吗？我只能违心地告诉他们，你们的妈妈是一个坏人。你们要相信党。去年，1957年，报上发表文艺界粉

碎了反党集团的报道后，祖慧^①从莫斯科打来长途电话，在电话里泣不成声，反复地说：“我不相信！我不能相信！”我没有勇气接电话，不敢听她的哭声，我坐在电话机旁，眼泪像泉水一样在我脸上流淌，火辣辣地在我心里流过。我无法和她对话，我能说些什么呢？陈明在电话里只能说：“你听党的话，不要管我们的事。你要坚强起来，要熬过去，自己好好学习、生活吧。”惨白的灯光把屋子照得像地狱似的阴惨惨的。陈明无可奈何地放下电话，我们互相望着，为天真无邪的受伤的孩子难过。祖林正好在国内，在北京，他也亲受了那沉重的打击，整天整天不说话，也不吃，只是躺在小屋里流眼泪。我宁愿自己受责备，挨罚，下地狱，上刀山，也不愿意看见他无言地在那里默默受罪。可是，我能说些什么呢？我不能应承，也不能解释。一切辱骂，一切讽刺，一切在冠冕堂皇言词下的造谣诬陷我能忍受吗？我能反抗吗？我能辩护吗？我只有匍匐流涕，椎心泣血，低头认“罪”。我的一切都被毁灭了，我还能在儿女面前要求得到什么呢？他们太幼小了、太天真了。他们如果还相信妈妈，他们就太惨了，他们也会挨打的。他们如果不再相信妈妈，他们将更苦，他们不只要承受失去妈妈的痛苦，还要承受从妈妈那里得来的耻辱。他们抬不起头，怕人家看见他们想起他们可耻的妈妈。他

① 祖慧是丁玲的女儿。